

**编者语：**本期栏目所选四篇文章，涉及儿童文学跨界研究、外国儿童文学发展研究、中国现代儿童绘本化创作，以及中国最早儿童刊物的封面艺术研究等。其中，对儿童文学跨界研究和中国现代儿童绘本化创作研究的两篇文章为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之成果。关于对儿童文学跨界研究一文，郑伟教授从三个层面分析了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在客观上为儿童文学知识创新带来的丰厚学术效益回报，同时，他提出还应在外来理论援引过程中保持审慎的态度。除此之外，其还从儿童文学自身理论建树的发展现实，指出跨界研究尚存的空间。谭旭东教授从纵横两个方面论及加拿大法语地区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并对加拿大法语儿童文学风格的形成原因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陈静探讨了中国原创绘本界把中国古代山水图式引入绘本的创作实践，文章通过分析儿童绘本以中国古代绘画长卷为蓝本进行再造、新造、改造后形成了契合儿童接受视角的新文化表达形态。钟佳晨的文章聚焦我国最早儿童刊物——《儿童世界》封面的女童形象设计，从1922年至1941年间共19年出版的刊物中封面人物的年龄、穿着、发型，以及所处地域、环境和玩具等指标入手，透视民国时期儿童刊物中女童形象的性别建构特点。

## 儿童文学跨界研究的效益与风险

郑伟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儿童文学具有比相邻学科更为开放的跨学科特点。通过援引外来理论资源与对外拓展研究，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效益。同时，一般理论在阐释儿童文学现象过程中，也存在着适切性上的隐忧，主流文学关于“强制阐释论”的讨论，为儿童文学的跨界研究提供了风险警示，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应在辨析效益与风险的基础上，力求建立以“童年幸福”为精神指向的学术共同体，使自身的跨学科特性在现实层面上获得更为合理的彰显。

**关键词：**儿童文学；跨学科；学科互涉；学术效益；童年幸福

**中图分类号：**I0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22) 05-0001-07

**DOI：**10.14091/j.cnki.kmxxyb.2022.05.001

### Benefits and Risks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ZHENG Wei

(Research Center of Strait Children's Literature,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China 350007)

**Abstract:**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stic of interdiscipline which is more opening than the adjacent discipline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and the research of external expans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gets great academic achievements. Meanwhile, problems of suitability are found for general theories which are used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n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mpulsive hermeneutics for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provides risk warning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benefit discrimination and risk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spiritual orientation of "childhood happiness" to show the self-interdisciplinarity on the level of reality with more reason.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arity; academic benefits; childhood happiness

**收稿日期：**2022-0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JA09324S)；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童年观念史”(19BZW147)。

**作者简介：**郑伟(1964—)，男，福建福州人，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研究。

儿童文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文学学科内部,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相邻学科存在诸多交叉地带,这些学科也会将儿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领地。在文学学科边界之外,儿童文学与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艺术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意识形态研究等也常从儿童文学中找到合适的学术话题。这样的跨界图景常常在我们描述儿童文学学科特性时被引用,也成为不少研究者论证儿童文学学科自主性与合法性的逻辑依据,突出的跨学科外显特征往往让人忽略对其内在学术肌理的深入剖析。有感于此,本文力求通过分析跨界研究给儿童文学知识创新带来的学术效益,以及援引外来理论可能导致的风险与隐忧,对儿童文学跨界研究的内在机制做初步的厘清,进而阐述建立以“童年幸福”为精神指向的学术共同体对儿童文学跨界研究的价值,以及共同体可能的发展方向。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将广义文学学科内部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称为相邻学科,把文学之外的学科称为外源学科。另外,“跨界”和“跨学科”在本文中具有相同的含义,将根据行文的方便,加以选择使用。

### 一、基于儿童文学立场的跨界问题

以跨学科来概括儿童文学整体的学术面貌并无不妥,但仅仅满足这样的认知则有碍于儿童文学理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跨学科性是否可以由儿童文学所独享?倘若不是,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性又当如何找到自身的合适定位。当我们把考察的视野置于整个文学领域时,就不难发现,跨学科在文学研究中几乎是一个习常的现象。有研究者指出:“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知识活动,文学研究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阐释技术等方面都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学理特性。”<sup>[1]</sup>“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的要旨是,文学研究能够以任何学科知识为知识学的依据对文学进行阐释,而最重要的是超越这些有限的单一学科知识视界,把所有学科知识的思想资源、学理依据、阐释技术凝聚为一个特殊的阐释视界。”<sup>[1]</sup>还应看到,随着“后学科”时代的来临,非但文学学科的跨界研究

实践得以广泛展开,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学科互动与融合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讨论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性就没有意义,实际上它在提示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基于儿童文学自身立场的跨学科特质,对其研究主体、思想方法等核心问题做出具体的辨析。为此我们不妨追问:在儿童文学研究中,谁在跨学科?何以跨学科?关联学科间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儿童文学应当怎样建立自身的跨学科视域?

儿童文学学科边界的复杂与模糊,使选择儿童文学为学术志业的研究者十分自然地以跨学科的方式从事知识生产,这是儿童文学跨学科最为基础、也最为显在的形态,这种原生性的跨界学术行为致使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只要加以积极倡导和必要的重视,就可以收获丰厚的回报,对跨学科内在运行机制的探讨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为了与原生状态的跨界研究形成比照,以下首先对外源和相邻学科的儿童文学研究做简要的分析。

其一,研究者将儿童文学作为本学科研究的重要思想与理论资源。国内学者刘晓东的儿童哲学与教育学研究、日本学者河合隼雄的心理学研究,都与儿童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文本中的儿童形象、童年生活场景,是作家基于真实生活进行的典型化艺术创造,可以为教育学、心理学等以实证性为特征的学术研究提供另一种类型的“真实”样本。研究者对这些“样本”的分析,也渗透着儿童文学学科所累积的思想与方法。细读他们的研究文本可以看出,研究者个人气质上的某种诗性特点可能是促成他们与儿童文学建立内在精神关联的动因。河合隼雄曾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儿童文学对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儿童文学并不仅仅是针对孩子的,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对于孩子而言,它都是有意义的文学。它作为描写以透彻的‘孩子的眼睛’所观察到的宇宙的作品,为大人们指出了一片意想不到的真实天空。”<sup>[2]</sup>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反哺了儿童文学,成为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重要引用来源。

其二,大多数相邻或外源学科的研究者,则是出于开拓本学科研究领地的现实需要而涉猎儿童文学。在这一学术视域中,儿童文学(作品、现象、理论、史料等)更多具有“材料”的性质。在当

下的学术环境中，很多学科知识生产的效率得以很大提高，时常响起“拓展学术增长点”的呼声，反映出开疆拓土的积极诉求。在此情形下，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相对不足的“边疆”地带，其间待开发的丰富“矿藏”开始显露出特殊的魅力。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写作）就对作为自身传统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投注了更多的学术热情。以儿童文学为“材料”的研究，是否能取得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如何被相关学科的方法论所统摄与化合。《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是近年欧洲学者情感史研究的一本力作，该书的十多位作者都是专业的历史学学者，他们将童年史、人类学、叙事学、阅读与学习理论、行为主义与接受理论等多元研究方法，用以解读历史上有影响的60多本儿童文学作品，阐释了童书在塑造儿童情绪上独特而显著的功能，描绘出儿童情感演绎的历史面貌，为史学界的情感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童年视角。

相邻或外源学科的跨界儿童文学研究产生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但这与基于儿童文学立场的跨学科研究在学术诉求上显然存在差异。从两者的比照中，可以看出儿童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

涉及儿童文学的跨界研究，尤其是以儿童文学为“材料”的研究，只要研究者有足够的兴趣和意愿，进入该领域似乎并不需要跨越太高的专业门槛，这在其他学科的跨界学术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现象一方面表明儿童文学是一个更具开放性的领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儿童文学在学科基础理论积累上的缺失，由于缺乏基于儿童文学自身学科立场的研究范式，也就难以形成必要的专业准入条件。如果儿童文学只是为其他学科提供可资开发的“初级矿藏”，而未能输出经由深度加工的学科知识的话，那么业已获得的学科地位也就显得有些成色不足。应当认识到，缺乏“自主性立场的跨学科研究显然是没有学术主心骨的，因而很难奢望其在学科间、系统间的动态运作中能有所作为。”<sup>[3]</sup>因此，秉持学科自主理念，构建学科主体性立场，恰当处理学科资源多元与学科自主之间的平衡关系，应当在儿童文学跨界学术实践中得以践行和持守。

## 二、学科互涉催生的学术效益

以往我们只是在儿童文学知识图谱的分布上描绘其跨学科的特点，当研究者对自身的学科特性有了更为透彻的自觉理解，原生性的跨学科状态才可能转化为不断催生知识创新的学术实践。以下我们从外来资源援引和拓界研究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李利芳在《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趋势与方法论》一文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其认为在意识形态与民族身份、儿童文学与文化、心理学方法和认知研究上，西方学者取得了丰厚成果。借助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生态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经验等理论资源，“建构出独立的儿童文学学科话语声音，它始终没有因为是‘儿童’的文学而‘自成一体’，而放弃与成人社会内在构成为‘一体性’的价值要义。”<sup>[4]</sup>在这样的学术格局中，儿童文学的自主性以及成人世界的丰富关联得到了体现。在总结中国学者取得的跨学科成就时，李文关注到：方卫平早期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儿童与文学活动的认知关系，探求审美性的儿童主体结构；朱自强最早在理论上系统倡导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提出儿童哲学、深层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童年历史学等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李文尤其关注到班马融合艺术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美学、教育学资源所取得的研究成就，特别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在儿童美学“前艺术思想”上建树甚大。如果联系20世纪早期周作人、赵景深等借助西方人类学观点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奠定理论基石，从中不难看出人类学在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悠远影响。跨学科的理论援引无疑成为儿童文学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时也应看到，有些表面化的学科知识交互，虽也能催生新颖的观点，甚至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却未必能够进入学科传统，成为理论经典的构成，只有将外源理论深度融入儿童文学的学术肌理之中，使之成为阐释儿童文学重要命题的利器，这样的学科互涉才有真正的价值。因而，有必要在肯定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对各种理论观点的阐释有效性和持久性做进一步的甄别。

儿童文学另一层面的跨界学术实践，体现为研

究者主动向相邻学科领域的积极拓展。20世纪80年代,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年)中,考察了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发起的“儿童文学运动”,对作家们在理论、创作、翻译、编辑上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梳理,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同源性在儿童文学的学科立场上得以初步彰显。21世纪以来,王黎君的《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2009年)从儿童视角、儿童形象、儿童文学文体与精神等方面,论述了儿童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观念气质、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的影响。谈凤霞的《边缘的诗性追寻——中国现代童年书写现象研究》(2013年)考察了“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童年书写的历史进程,探讨这一现象对现当代文学的意义,该研究既关涉儿童文学又不限于儿童文学,融通了儿童文学与主流文学本不该存在的壁垒界限。这些研究从文学史实的层面上,将儿童文学研究拓展至更为开阔的领域。朱自强的《“儿童的发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儿童的发现”:周氏兄弟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等论文,则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凸显了“儿童的发现”对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价值。

儿童文学学者的拓界努力,使儿童文学与相邻学科的合理关系得以初步建立,有助于还原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真实面貌。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从文学批评、史学叙事等角度对儿童文学的观照,这种观照是将儿童文学纳入整体的中国文学知识建构系统之中,童年视角在此具有了一定程度方法论上的意义,这与一般的以儿童文学为“材料”的跨界研究有所不同。这一维度的研究总体而言仍不够系统和深入,留下不少有待完善的空间。

近年来,张炜、马原等一批当代知名作家开始涉猎儿童文学创作,跨界写作自然引发了跨界批评,就目前的态势看,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者,都倾向于强调这些作品与主流文学之间的共通性,这有助于打破儿童文学长期被狭隘“儿童性”所局限的思想藩篱,同时也为儿童文学与主流文学展开平等对话提供了机会。主流文学界的批评主要聚焦于作家跨界写作的动机,以及文本呈现出的思想与艺术新质。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考察当下作家的跨

界写作与冰心、叶圣陶、张天翼等开启童年书写先河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文坛身份、创作动机、艺术追求、作品传播方式上的种种异同,将有助于厘清相关作品在童年精神彰显以及儿童审美趣味营造上的种种得失。此外,当下作家的儿童文学写作通常选择与成人世界相近的少年生活题材,这自然便于两种类型书写习惯和文学理解的衔接。如果我们将其与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童年书写,以及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跨界”写作留下的儿童文学精品进行相互比照,或许就会对当下作家在“儿童性”与“文学性”把握上的优长与不足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跨学科的角度看,这样的研究从内容或方法上涉及了教育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我们思考儿童文学的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本的可接受性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一部以现代性为思想脉络的文学史著作,作者设专节讨论儿童文学在当代文学政治与审美的紧张关系中的生存状态,以及新时期儿童文学从传统回归到现代性延续的演进历程。童年视角的介入为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历史叙事提供了“新质”。但由于主流文学长期以来对儿童文学的忽视,致使研究者对儿童文学难免存在一定的隔阂感,这在《主潮》的论述中也有所体现。在讨论“十七年”儿童文学时,著者写道:“虽然儿童文学作家们时刻牢记文学对儿童的政治教育功能,但它仍旧和五四时期培养起来的陶冶教化的现代审美观有着精神上的最后一点瓜葛——尽可能地维护艺术的审美性和尊重儿童的趣味。……这也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和五四的唯一纽带——两种现代性在这里找到了心气相通的地方。”<sup>[5]</sup>以“陶冶教化”来概括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审美观显得较为粗疏,没有关注到现代儿童文学初期思想观念与艺术主张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认为“两种现代性”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得以“心气相通”,也忽视了当时作家更为复杂多样的创作动机与心态,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此外,著者在讨论新时期儿童文学时,虽然对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了评述,也关注到儿童文学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但并未真正阐明新时期儿童文学与中国文学整体的现代性存在怎样的关联性。

不论是外来理论的援引还是研究者的拓界研究，在总体上都促进了儿童文学的知识创新。要在文学大系统中真正实现具有思想与学术融通性的学科互涉，还有待于研究者围绕具体的儿童文学现象展开互动式探究，实现理论成果的深度互文，推动跨界效益的高品质增值。

### 三、“强制阐释论”提示的跨界风险

在充分肯定多源理论资源交互对儿童文学知识创新意义的同时，也应对理论“外溢”而引发的可能风险保持一定的警觉。儿童文学在与外来理论的碰撞中，对如何把握外来理论对自身问题阐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需审慎加以对待。

2014年，学者张江提出“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命题，对西方文论中广泛存在的脱离文学，以先在理论对文本行使阐释强权的现象提出批评。“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sup>[6]</sup>论者认为“强制阐释”具有四大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其中，“场外征用”是指“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煞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sup>[6]</sup>该命题的出发点是西方文论，但在随后的讨论中，批评者更多聚焦于国内文论界因“食洋不化”，致使西方理论的弊端得以放大和强化的现象。有学者指出：强制阐释论“表面上是在反思西方当代文论偏离文学本质的错误做法，其实却是在痛斥国内学界滥用西方理论的社会乱象，……张文的主观意图，是想消除新时期以来，人们盲目崇拜西方话语的错误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文论的失语症。”<sup>[7]</sup>这对于广泛借助多源理论资源，引进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势头正健的儿童文学界而言，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21世纪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系统译介取得了新进展。“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2008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2010年）、“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译丛”（2021年）三套理论译丛，以及其他的理论译著，较为系统地展示了西方学者取得的前沿成果。西方儿童文学学者援引外源理论的广度与深度获得了国内同行的认可。

赵霞认为：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迅速吸收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丰富理论资源并引为己用，以儿童文学文类为中心，建立、发展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理论与批评体系。可以说，迄今为止，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曾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得到过运用或试验。”<sup>[8]</sup>舒伟积极评价彼得·亨特在学科知识整合中取得的成就：“亨特的贡献在于将主流文学批评理论、考察范式和批评实践与儿童文学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儿童主义批评’视角，……使儿童文学研究突破了依附主流文学批评的束缚，也不再作为教育学科的附庸而存在，最终形成了独立、自洽的文学学科。”<sup>[9]</sup>与此同时，类似于“强制阐释论”提出的“场外征用”的弊端也受到了关注：“从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为自己打开文学理论的储存库开始，机械搬用、套用经典理论的现象始终存在。”<sup>[8]</sup>“这些作者都有较好的现代文学理论背景，对20世纪前沿学术有深刻的把握，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儿童文学也显得颇为自觉。但或许是太过于急切，运用时常显‘化’得不够，常常是阐释某一理论时到具体的儿童文学作品找例子，而不是用这一理论论述作为整体的儿童文学。”<sup>[10]</sup>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在西方主流理论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儿童文学理论，存在着征用一般理论强制阐释儿童文学的隐忧。对于长期以来理论积累相对薄弱的中国儿童文学界而言，这些域外理论所激发的学术创新热情，有可能使这一隐忧被无意忽视与暂时遮蔽。

儿童文学原生性的跨学科属性，为不恰当的场外理论征用而导致的“强制阐释”提供了机会，但在关注“强制阐释”风险警示的同时，也应看到儿童文学与主流文学在知识生产上的根本差异。“强制阐释”是在主流文学知识生产出现“饱和”甚至“过剩”的背景下被不断强化的，其间也包含着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导致的本土文论失语的问题。文学研究取用外来理论以阐释文学现象，无疑带来了丰富的启发性，只是当这种阐释路径被过度依赖，以至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被消融于抽象的理论演绎中。在此情形下，才催生出强大的“反叛力量”，“强制阐释论”及其引发的热议，就是这种反叛力量的一次集中喷发。对于知识生产尚显不足的儿童文学而言，援引外源学科的思想与方法非

但谈不上“饱和”与“过剩”，在有些领域甚至还远未开始。回顾上文谈及的跨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即使在文学学科内部，儿童文学与相邻学科的交互也多发生在现当代文学领域，研究文学基本原理的文艺学尚未与儿童文学发生深刻互动，这种局限于“文学内容”，而未涉及“文学原理”的学科互动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从另一方面看，儿童文学知识生产上的相对滞后，也有可能带来某种“后发优势”，使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有机会规避主流文学在外来理论征用中的不良倾向。如何看待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在运用一般理论时“化”得不够的问题，以及这一问题与中外主流文学中的“强制阐释”现象之间的异同，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话题。

在谨守“强制阐释论”风险提示的前提下，儿童文学研究依然可以从中西文学理论的互补中探寻合适的知识创新之路。以文学赏析为例，这原本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前辈学者对此着力甚深，并留下许多宝贵成果，但传统赏析太过依赖个人的阅读体验，缺乏必要的理论深度，在追求学理化、系统化的学术语境中，难以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目前仅存在于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中。如果能够将评点批注的传统文学鉴赏方式，以及“披文入情”的品鉴趣味与西方新批评文论的“文本细读法”进行合理互补，就有可能提升文学赏析的理论品位，并对儿童阅读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笔者认为，儿童文学跨界研究的主要风险，更多体现在表面化的学科交叉互涉遮蔽了学科内在的知识整合，致使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格局仅停留于表层的繁华与热闹，影响了知识创新的内在品质，同时也存在生硬套用一般理论的潜在风险，为避免重蹈主流文学“强制阐释”泛滥的覆辙，应在理论资源援引过程中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外源理论为有效阐释儿童文学提供思想与方法动力，而不是让儿童文学为印证理论正确提供佐证。

#### 四、指向童年幸福的共同体建构

多源学科的介入引发了建立学术共同体的吁求，这种吁求近年在儿童文学界颇具声势，但在儿童文学学科主体性尚未充分确立的情形下，实现真正意义上学科间的知识有机整合与融通以体现共同

体一致性的学术追求，实际上仍有很大难度。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成员间形成趋同的价值观念，具有一致的目标追求，秉持相似的思想理念，对于学术共同体而言，还需要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之间，通过交流、磨合、协商达成某种共识，进而形成可以彼此理解与接受的学术话语，消弭不同学术规则与文化之间的不适（甚至冲突）。依凭这样理想化标准，儿童文学跨学科共同体的建立依然任重道远。作为共同体的主导学科，儿童文学现有的知识积累还不足以为其他学科提供原创性的研究方法或阐释工具，但可以在精神理念上提出共同体成员共同追求的方向，为共同体建构注入思想动力。

儿童是儿童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价值归宿。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也许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sup>[11]</sup>最具人性的童年应当使儿童处于生命良性发展的状态之中，我们可以把这种状态概括为“童年幸福”。回溯人类思想史，思想者为建构童年幸福的种种努力虽早已开始，却命运多舛，至今仍远未完成。启蒙主义者以“发现者”的姿态将儿童从成人世界中分离出来，力图建立独立的童年王国，其目的显然指向了童年幸福。但儿童家庭、学校、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显示，这种追求并未获得完美的结果。独立的童年王国为儿童提供了特殊保护，但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压抑了儿童生命的自然成长。可以说，“现代”的童年建构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问题重重，造就童年幸福的最初动机甚至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成为异化童年的力量。后现代主义试图消解“现代”儿童观赋予童年的种种浪漫想象，揭示其间隐含的成人意识形态图谋。而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儿童观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童年现代性建构中负面效应的不满而做出的思想与理论反叛。两者的儿童观看似对立，但其背后的根本动机都指向了更为合理的童年生存状态，不论是现代儿童观的“立”，还是后现代儿童观的“破”，都是希冀人类在自身的生命启端处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可将其视为为童年幸福立论的话语实践。应该看到，不论在什么样的理论语境中，我们都难以对何为童年幸福做出精确的回答，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经济条件都可能催生差异甚大的童年幸福

观。幸福作为一个悠久的哲学命题，与其他的哲学命题一样，只有在不断地反思中去无限接近对其真理性的认知，而不可奢望获得稳固不易的终极答案。正如赵汀阳认为：“如果说，变易是万物通理，那么，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变易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于是，普遍一般的性质意味着永远的现时性，而不在于不变之本质或理念，……万物的根本原理并不隐藏在不可及的理念之中，而在于其直接的可及性，所谓‘道不远人’。”<sup>[12]</sup>对于童年幸福而言，研究者只能基于当下人类理性可及的层面，去探究其合宜的内涵。

童年幸福是我们为儿童良性发展预设的一个理想方向，儿童文学可以为这一理想提供言语审美维度上的独特贡献。儿童文学跨学科共同体应该是一个以童年幸福为精神指向的“想象共同体”，以大学为平台的各种学术活动是这一观念形态共同体的现实载体。有助于共同体成员达成精神共识的学术活动包括：围绕某一主题召开的研讨会、论坛；学者们就某一问题发表论文、笔谈；通过媒体发表个人观点；小范围的深度交谈及发表；带有私人性质的深度交流等。不论是哪一种形式，都应体现为具有包容性的思想、观点、方法的互动与交锋。其中既有学者们在思想和观点上的彼此赞许、认同、呼应与互补，更应该有不同理念与观点间的商榷与辩驳。朱自强是学术争论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看来“对一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没有学术争论是很不正常、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学术争论是学术讨论的一种重要形式，更是学科建设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学术争论往往凸显学科内的重大问题并将争论双方以及‘围观者’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所谓真理不辩不明。”<sup>[13]</sup>在“思想”退潮“学问”登场的整体学术氛围中，对学术论题各取所需、各自言说成为一种常态，富有创见并能促进共同体终极价值生成的学术争论，仍有大力倡导的必要。

同时，还应当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视角出发，推动共同体成员的合作研究取得实绩，促成彼此间的认同。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提出的“知识生产新模式”从“动力学”（*dyamic*）的视角，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定义为“模式2”，以区别于传统学科知识生产的“模式1”。“模式2”并

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互涉，而是一种建立在应用情景中解决某一实际问题的知识生产机制。在这一机制下，跨学科模式体现为“知识在大范围的潜在知识生产场所之间和不同的应用环境之中进行传播。”<sup>[14]</sup>具体而言就是“存在于一个不断的连接和再连接的过程之中，存在于在特定应用情境之中的临时聚合在一起的知识的集群和配置之中。因此跨学科具有很强的问题解决导向。”<sup>[14]</sup>

21世纪以来，产生广泛影响的儿童阅读推广，实际上就是“模式2”在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场域中得以实际应用的生动例子。儿童文学学者的文学学科知识与教师的课程教学实践，在语文教育现场得以深度结合，深刻促进了语文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变革。随着活动的深化，不同领域的参与者不断加入这一以阅读塑造童年幸福的共同体中来。教育学、图书情报学、传播学、儿童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以及出版业者、社会工作者、家长等都为此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儿童阅读推广不但促成了儿童阅读问题的实际解决，而且其活动过程所引发的种种现象又为各学科的理论知识生产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以童年幸福为精神导向的共同体意识，在儿童阅读情境中得以自然生成，在这一过程中，儿童文学学科在其中发挥了实际上的主导作用。这样的知识生产模式如果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以践行，“想象共同体”就获得了现实条件更为有力的支撑，“想象”的精神意义也因此获得了升华。

## 五、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作为一个跨界特质鲜明的学科领域，在赢得相邻和外源学科学者的积极参与，并在理论资源援引、研究视域拓展取得积极进展的情况下，应当对学科互涉过程中潜在的“理论征用”风险保持审慎的警觉，从主流文学“强制阐释”引发的种种弊端中吸取教训，力求实现跨学科发展的“后发优势”。在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中，应将共同精神价值的倡导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力求通过富有活力的学术活动和实践探索，促进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并最终实现价值观念上的彼此认同。

（下转第44页）